

档案

揭秘外交风云

朱纪华◎主编

学林出版社

档案

揭密外交風雲

朱纪华◎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 朱纪华主编.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486 - 0614 - 7

I. ①档… II. ①朱… III. ①外交史—历史档案—中国—近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8645 号



档案揭密外交风云

主 编——朱纪华
责任编辑——吴耀彬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c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2.5
字 数——24 万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614 - 7/K · 58
定 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和不可再生的唯一性,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档案部门理应发挥集聚与发散历史文化信息的这一独特长处,坚持为社会大众、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档案文化本身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深入地认识档案的文化价值,挖掘档案的文化内涵,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档案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档案部门不容懈怠的职责。

《档案春秋》杂志是上海市档案馆精心打造的档案文化品牌,一直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作者、读者的关爱。她依托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蒐集精彩图文,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传播档案文化。她不仅以严谨、严密以及鲜活风格,在历史人文类杂志中独树一帜,而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2011年度荣膺网络传播国外公共图书馆阅读TOP100排名;2012年《档案春秋》蝉联第五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

近五年来,我们尝试以“书”的形式,把档案文化的散在成果集中起来,进行二次传播,先后出版了《档案春秋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和《那个年头,那些事》、《档案里的金融春秋》等六种书籍,收获的市场好评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设想。我们理解,读者之所以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仍愿意阅读《档案春秋》,是因为他们不仅可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信息,满足人类所共有的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而且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也许在某一层面上与他们的个人记忆关联或相互碰撞,从而为他们认识某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个人与时代,小我与大我,在某一个记忆点上真正实现了彼此交融,互为补充,迸发共鸣。

档案文化的核心资源是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即历史,是任何一个民族

藉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根。挪威档案学家列威·米克伦曾经说过：“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尊重历史，以档案说话，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来面貌。因为在诸多历史元素中，档案的可信度是最高的。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开明度的日益提高和法制建设的完善，档案的解密与开放已纳入常态化的管理轨道，许多曾束之高阁的档案材料开始进入社会视野，受到了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部分外交档案的开放，不仅研究价值非凡，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04年起，外交部档案馆陆续解密并开放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外交档案。从2006年起，《档案春秋》编辑部即集中人力、物力，经过精心策划，或专程派出编辑记者前往外交部查档采写，或邀约著名文史学者和外交部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文，对解密档案深挖细作，在《档案春秋》杂志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些文章内容丰赡，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交往中的若干重大事件，以及深蕴其间的鲜为人知的众多细节，真实感人，读来如临现场。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度春秋的积累，这些篇什无论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已日见厚重，可以集结成册，出版以飨读者了。本书中的文章皆以档案资料为依托，用严谨质朴的文字和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客观公允的视角，努力还原历史；既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又能体现集真实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档案文化传播特质，相信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特别是经历了那个时代变迁的同龄人的阅读需求。在此，我们要向外交部档案馆的同仁们致以敬意，对他们的辛勤工作和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档案是历史发展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应把档案文化放在档案事业发展体系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档案独特的文化功能，彰显其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固有地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朱纪华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

《档案春秋》杂志编委会主任）

目 录

中美交换被扣人员的外交斡旋	张 琼 / 001
第一次对外建交高潮	徐京利 / 005
新中国第一批“使”字牌照	唐 军 / 019
寻找拉姆斯菲尔德的失踪密友	李筱春 / 022
解密“波兰事件”	王 倩 / 027
外交解密档案中的中苏关系及冷战铁幕	沈志华 / 038
周恩来与“烤鸭外交”	唐 军 / 048
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轶事	豆 火 / 055
解密外事警卫制度	唐 军 / 066
档案记述的中苏建交轶事	苑基荣 / 071
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纪事	唐 军 / 080
中国援外医疗队印尼之行	豆 火 唐 军 / 092
三千印度战俘在中国的真实生活	罗山爱 / 101
旅居海外华侨换发新中国护照始末	唐 军 / 113
外交礼宾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文 林 / 118
与埃及建交二三事	唐 军 / 127
中国为何援助鲍威尔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	豆 火 / 137
新中国援助非洲忆往	孟庆涛 / 149
中国首次接待来访外国政府首脑的幕前幕后	唐 军 / 162
中国如何向美国记者采访开禁	张晶晶 / 172
老挝王室子弟中国留学记	周晓瑛 / 186

中美交换被扣人员的外交斡旋

张 琼

据外交部新近开放的解密档案记载,1954年4月至7月,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五国外长会议。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中美两个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通过英国从中斡旋,开始了直接接触,开启了中美领事级以及随后大使级会谈的大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国仍处于实际上的敌对状态,但美国有一桩心事必须要和中国交涉,即要求释放因侵入中国领空和领海而被俘的美军事人员以及触犯中国法律被扣押在华的美国人。

1954年3月,美国新闻媒体连续报道被中国扣押的32名美国人问题。舆论称美国国务院已通过英国、印度,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共产党国家提出过多次抗议,甚至请苏联从中说项,但均无结果。

自5月初开始,美国不断通过媒体来试探中方态度,最后决定委托英国代表团成员、英驻华代办杜威廉作为中间人来斡旋。

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威廉以英国驻华代办的身份,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外交部长宦乡,就改善中英双边关系问题进行频繁接触。

5月19日,杜威廉在与宦乡的磋商即将结束时,提到愿意以私人身份就“中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居中斡旋。杜特别声明,这只是纯粹以私人身份提出来的,中国如果愿意他一定会尽力。

宦乡回答:中国并没有扣留美侨,美国侨民愿意申请出境的,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如债务纠纷、犯罪行为、私行越境等),都出了境。相反,美国扣留了许多中国留学生,不许他们回国。现在杜威廉先生愿意斡旋,因本人不是主管者,现在不能答复,待请示后再答复。

5月22日,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及

要求中方释放犯罪在押的美侨问题,并承认美国政府对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

在此期间,美国媒体已经将英国人居间斡旋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报道,称与中国代表团的协商正在非正式的幕后进行。西方官方人士不愿谈及此事的进展情况,他们害怕时机不成熟的言论将会使双方微妙的对话胎死腹中;也有对这位英国中间人品头论足的,说杜威廉在北京时实际上是被中国人置之不理的,而现在此地与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们非正式会谈多次,他在这里与中国人的接触,比好几年来在北京时还要多;最后还有结论性的传闻,说英国在共产党中国曾经一般地代表过美国的利益,但是在俘虏问题上却一直遭到拒绝。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认为在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人员的机会,开辟中美直接接触的渠道。

5月2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黄华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驳斥美方对我的诬蔑宣传。谈话提到:

少数美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中国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处理,这是任何主权国家的职责。

对这些犯法被拘的人,我们都掌握充分的证据。这些因犯法而被拘留的美国人中有居留中国的美国侨民,还有从天上降落下来或从海上钻进来的。

美国政府对于在美国境内的中国侨民,尤其是五千多中国留学生强行扣留,不准其离开美国,否则将被判处五千美元的罚金或五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予以两种处罚,则是横加压迫。同时中方发言人表明立场:中美双方应直接就此问题进行接触。

随即美方也通过英方转告,可以举行直接接触。但之后却无进一步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反对美国代表团同中方接触。这时杜威廉传话说:美国代表团仍愿经过英国介绍与中国方面直接谈判,现正等候美国国务院指示。

周恩来在6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到:“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及美国代表团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我们拟再等候一段时期,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当然首先要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留问题,并区别对待犯法美侨和其他美国人。如美方确实不愿与我方接触,则我们即拟发表声明,说明我方惩处犯法美侨及保护守法美侨的一贯政策和实际情况,同时揭露和驳斥美方扣留我留学生的无理行为。”

6月4日上午,杜威廉在与宦乡就中英双边关系问题的磋商即将结束时,谈到关于安排中美会谈问题,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就侨民问题举行会谈,并且要求杜本

人也参加会谈。美方将以美国代表团成员、美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代表(其人在美国代表团内的地位仅次于史密斯和罗伯逊)。希望中国方面以同等级别代表出席,如果能派王炳南先生作为代表就太好了,并希望第二天(即6月5日)就能安排一次会谈。

宦乡回答:中国原则上是同意接触的,但关于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等问题,将请示后再答复。

当日下午,宦乡与杜威廉再次磋商。宦乡表示:考虑到杜威廉当日要前往伦敦,而中方有关官员第二天也将暂时离开日内瓦几日,建议等杜从伦敦返回后再谈。但杜威廉说他的行期可以更改,坚持第二天上午谈一次。宦乡同意道,既然如此,明天上午就进行初步接触。

6月5日,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中美代表首次正式接触。中方代表王炳南,美方代表约翰逊。上午10点,杜威廉带着美方代表约翰逊、助手马丁以及翻译艾克弗尔进入会议室,向已等候在此的中方代表介绍。约翰逊主动走上前与中方人员握手,称很高兴与中方代表会面。

会晤一开始,王炳南就说明由于中方主管官员事先已定好要赴柏林开会,所以此次只是初步接触,正式商谈从下星期开始。

按一般推断,杜威廉应已将中方关于首次仅作初步接触的想法转告美方,但约翰逊仍表示感到失望,并声称已受政府全权委托,希望能在这次商谈中得出结果(从后来美方所持立场看,第一次会谈根本就不可能得出任何结果)。王炳南不得不提醒说,此前当杜威廉先生告知我们美国代表团愿意与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曾立即表示愿意直接接触。拖延的责任并不在中方。

初次会晤持续了十五分钟。

从6月5日至6月21日,中美两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共进行了四次会晤,就双方交换被扣人员回国问题进行针锋相对、讨价还价式的磋商。在6月5日第二次会晤中,中方同意在押美国人可以通过北京红十字会与亲友通信(此次杜威廉仍以中间人身份参加,以后就不再参加);在6月15日第三次会晤和6月21日第四次会晤中,中方建议由双方起草一份联合声明,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侨民将具有回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完全自由;在第四次会晤时,中方又提出关于委托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但以上建议均被美方拒绝。

7月21日,就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当天,美方通过联络人建议双方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继续就侨民及留学生回国问题保持联系,中方表示同意。随后中美就上述一般领事事务进行多次接触,又称之为领事级会谈。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开始的中美接触和会谈,虽然没有在平民回国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成为两国保持接触、交换意

见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美国政府于7月13日对此作出反应,建议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整个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被扣人员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在第二项议程下,双方均可提出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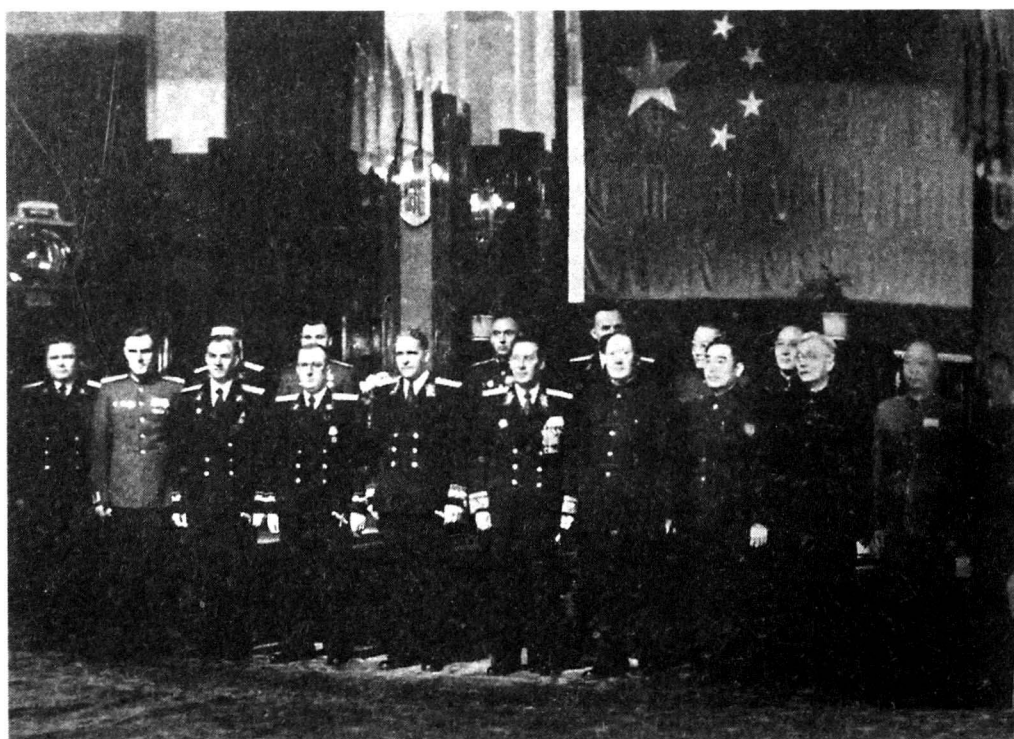
9月10日,第十四次大使级会谈中,中美双方就第一项议程达成协议,发表中美两国大使协议声明: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

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至1970年2月20日,历时15年,共进行了136次。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作为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接触的途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第一次对外建交高潮

徐京利

1949年10月2日一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部大楼里召见了国民党广州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接受苏联首任大使罗申递交国书后合影

双方礼节性地寒暄两句,然后,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将一份照会递给这位“代办”,声明说:

由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造成中国的军事、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当时阎锡山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作者注),并已变成广州省政府而失去了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这

一情况造成了中国与外国间外交关系的断绝。莫斯科政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已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

“代办”表情尴尬，对苏联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并表示会马上将苏联的决定报告国民政府“外交部”。

送走国民党的“代办”之后，葛罗米柯签发出了给周恩来的电报。

第一封承认新中国的电报

当天晚上北京时间9点来钟，葛罗米柯的电报送到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面前，电文说道：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安德烈·葛罗米柯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莫斯科

如此迅速地承认新中国，并断绝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关系，无疑是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有力支持。对此，中国政府非常高兴。

10月3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苏联政府的复电：

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很荣幸地收到阁下本年十月二日来电关于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于北京

在这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常驻莫斯科的戈宝权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命令他即刻开始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建馆工作。

苏联方面则任命其原驻北平总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

10月4日,周恩来给戈宝权发去指示,命他立即向莫斯科原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代办”发布如下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取得苏联政府的承认,苏联与广州阎锡山政府已经断绝外交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派遣大使来莫斯科,并将派领事至苏联各地,接管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你及原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和驻苏各地领事馆的一切工作人员,必须负责保管中国大使馆与各领事馆的档案、文件和一切财产,安心听候接管。为了祖国的利益,我认为你应当这样做。如有破坏或迁移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当追究责任,并予以法办。中央人民政府现已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馆的参赞,并兼临时代办,并责成戈宝权代办即日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洽商保管和接收事宜。我希望你及原大使馆的人员,对此电令立即答复,并告如何执行此电令的意见。

10月7日,戈宝权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葛罗米柯副外长,向苏方通报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指示的内容。

随后,在苏联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戈宝权前往位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13号的原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

国民党政府是在1933年12月同苏联建交的,第二年在莫斯科设立了大使馆。大使馆的馆舍是当年苏联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一幢18世纪的别墅式建筑。国民党政府先后由颜惠庆、蒋廷黻、杨杰、邵力子、傅秉常等出任驻苏大使。

到苏联宣布与其断交时,除了莫斯科的“大使馆”外,国民党政府还有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的12个“总领事馆”或“领事馆”。

戈宝权到达“大使馆”后,向有关人员宣布了周恩来外长的命令,表示从即刻起,将“大使馆”接收过来。

接下来,戈宝权等开始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苏联的率先承认,使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烈支持,继葛罗米柯副外长来电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各国外长纷纷致电周恩来:

10月3日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罗马尼亚外长安娜·波克;

10月4日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朝鲜外相朴宪永；

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代外长威廉·西罗基、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瓦夫·莱西斯基；

10月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却尔巴桑；

10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长窦丁格尔；

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

来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和热烈赞扬，并代表各自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立即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且断绝了同原国民党政权的关系。

根据这一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同承认新中国并断绝跟国民党残余集团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谈判立即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外长依次复电，表示中国政府愿意立即建立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

刚刚成立的外交部一片繁忙。

苏联大使火速保第一

随着新中国与外国邦交的建立，派遣和接受使节，就成为一项很重要的外交活动。

10月3日，苏联政府便任命其老资格的外交官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罗申为驻华大使，使其成为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位外国使节。

罗申曾于1939年以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助理的身份来到中国，两年后升任武官。1944年他返回苏联，参加东普鲁士白俄罗斯的作战。1945年7月，罗申再度来华，出任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多年的在华经历，使罗申通晓中国事务，而在新旧中国两度出任驻华大使一职，更使他感慨颇深。

中国政府随即宣布，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国首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

10月10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彩旗飘舞，人海如潮，一派盛大的欢迎场面。下午4点18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欢快的乐曲声中，罗申大使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车站。

站台上，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面带微笑，注视着缓缓而至的列车。周恩来的身边，有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以及董必武、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张治中、史良、邵力子、廖承志等新中国党政领导和民主人士。

从中苏宣布建交,到罗申大使抵达北京,前后只有十天时间,应该说是很快的,罗申的行程安排得非常仓促。

罗申之所以这么快就到了北京,这里面有个原因。

当初,苏联方面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那里听到消息,说英国政府有可能会迅速承认新中国。苏联听到这个消息有些着急。

因为当时前英国大使馆一直有人留在北京,苏联人担心,如果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他们“近水楼台”,可以很快委任大使,拔得头筹。苏联怕英国人抢了第一,为了获得第一个呈递国书的地位,苏联政府决定罗申立即启程。

列车停稳之后,罗申大使缓步走出车厢,同迎上前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热烈握手。

罗申代表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作为苏联政府的代表,他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增进苏中两国间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

罗申致词后,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答词。

随后,宾主一起步出车站。

车站外面红旗招展,身着各色服装的三千多名群众挥动彩旗和花束,热烈欢迎友好使者的到来。

在外交活动中,大使到任是一件大事,按国际惯例一般情况下会由驻在国外交部的礼宾官员到机场、车站或码头迎接,政府高官出面的很少。

新中国刚刚成立,也制定了一个《接待各国使节办法草案》。其中区分了接待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驻华使节,采取不同的礼宾礼仪。

当时规定,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使,在他们入境的时候,由外交部派驻入境处的联络官和当地外事处负责人一起前往迎接,并安排专车或定好机位,陪同大使来京。大使抵京时,由外交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交际处处长、北京市副市长、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前往迎接。

资本主义国家驻华大使抵入境口岸时给予同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使大致相当的外交礼遇。在他们抵达北京的时候,仅由外交部交际处处长前往迎接,如果是公使抵京,则由交际处科长出面。

像欢迎罗申的这种高规格场面实在是一个破例,而且仅此一次。

罗申当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官,各种场面见得多了,不过还是头一次经历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他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地感染了,不停地挥动双手,向欢迎群众致意,并不断高呼“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等口号。

10月16日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从罗申手里接受了外国使节递交的第一份国书。

递交国书仪式安排在下午5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按照既定的礼宾程序,当天下午4点多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乘礼车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迎接罗申大使到中南海勤政殿。

秋天的北京天气很好,中南海内更显碧波荡漾,绿柳垂绦,彩菊竞放。

由数辆轿车组成的车队穿过北京市区的街道缓缓驶进中南海,在勤政殿前停下。罗申大使、齐赫文斯基参赞,以及其他随从人员走下汽车。

外交部办公厅王炳南主任迎上前来同罗申握手,排列两旁的军乐队演奏欢迎曲,仪仗队向罗申大使行注目礼。

随后,在王炳南的引导下,罗申及其随员来到勤政殿外的会客室门前,同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外长见面。

周恩来微笑着同罗申握手、互致问候之后,由齐赫文斯基参赞将罗申大使的随员向周恩来一一作了介绍,然后宾主一同进入勤政殿。

这勤政殿当年曾是慈禧太后驻苑听政的地方,民国时期由袁世凯将其改建成西洋风格的殿堂,用来接见外宾。毛泽东等搬进中南海办公后,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也经常在这里举行。

勤政殿内庄严肃穆,正北面,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平平展展地高悬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屏风之上。两旁的八角宫灯同几盏晶莹透亮式样别致的壁灯交相辉映。

在礼宾官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及其他参加仪式的人员已经到位。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神情庄重地站立在大厅的核心位置。罗申毕恭毕敬地走到毛泽东主席面前,向毛泽东行一鞠躬礼。待毛主席答礼后,罗申双手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署的国书呈上。

这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白色的封页上凸印着苏联的国徽,里面用俄文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

主席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切望始终不渝地促进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所如此幸福地建立起之友好关系,并深信巩固苏中之间的友谊,符合和平与国际安全之利益。因此,决定任命公民尼古拉·瓦西里维奇·罗申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公民尼古拉·瓦西里维

奇·罗申本国书,请您,主席先生,惠然赐见,并信赖其荣幸地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向您所陈述之一切。

什维尔尼克(签署)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葛罗米柯副署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49年10月3日

毛泽东接过国书。这时,四周的摄影灯一齐闪亮,中外新闻记者们纷纷按动快门,记录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接下来,由罗申向毛泽东主席致颂词:

主席阁下:

鄙人奉了重大的使命,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的资格向贵主席呈递苏联政府所授予的国书,首先表示十分荣幸。在呈递国书的时候,鄙人请求贵主席相信鄙人一定要努力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十分幸福结成的友好关系。中苏友谊的巩固,不但有益中苏两国人民,而且有益于全世界和平和国际上的安全。同时鄙人希望获得贵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体官员对于完成鄙人所负使命的帮助。谨向贵主席并经贵主席向全中国人民庆祝这一历史上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次胜利为中国开辟了走向自由民主发展的广阔道路。

谨向贵主席祝贺荣任贵国元首。

敬祝贵主席政躬康泰,并祝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

罗申致颂词完毕,毛泽东主席致答词。勤政殿内回荡起毛泽东浓重的湘音:

罗申大使先生:

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贵大使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的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在此,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